

B 白城记忆

新四军三师平定白城叛乱

●宋德辉

1945年12月28日，毛泽东根据东北斗争的实际情况，发来了著名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电报。电报指出了东北斗争的艰苦性，及时地提出了把东北的工作重点放在距国民党军队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方面，“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以便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逐步积蓄力量，准备在将来转入反攻。在电报中还特别提醒说：“必须使一切干部明白，国民党在东北一个时期内将强过我党，如果我们不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在一年之内，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的紧急时机内，打下初步可靠的基础，我们在东北将陷入孤立，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有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反之，如果我们紧紧依靠群众，我们就将战胜一切困难，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指明了东北工作的正确方针，对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坚定信心，最后夺取东北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6年1月12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在郑家屯建立了西满分局和军区，随即黄克诚向东北局建议把新四军的部队与西满军区合并，使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相结合，使地方有主力部队便于开展工作。不久东北局任命黄克诚为中共西满分局副书记兼西满军区副政治委员，西满分局书记为李富春。此后，又任命黄克诚为西满军区司令员。

新四军三师是“皖南事变”后组建的部队。

1941年“皖南事变”不久，中央军委即发布重新组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赖传珠为参谋长。在华中的新四军、八路军各部队，统一改编为新四军，共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雄任参谋长。

1945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后，9月23日，黄克诚接到上级命令，率新四军三师主力3.5万人开赴东北。11月25日到达锦州江家屯。经二个月的徒步行军，跨越江苏、山东、河北、热河、辽宁五省，完成了进军东北的战略任务。到达东北时部队人数为3.2万人，减员近3000人。

11月26、27日，黄克诚根据到东北后遇到的具体情况，先后向毛主席和军委报告了当时部队的实际问题，即“七无”情况。“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这些对部队作战士气影响较大。同时，还提出了在东北建立根据地，在思想上要有和国民党长期作战的准备的张。这些建议对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决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新四军三师与西满军区部队合并后，很快打开了局面。从1946年初开始，先后解放了阜新以北，彰武东西以及扶余、农安、前郭旗、德惠、大赉、乾安、三肇及今天的白城一带，并开始发动群众，建立各级人民政权，组织清匪反霸和开展土地改

革。我市的五个县市区也由此解放。

据白城地区各县(市、区)地方志·大事记中记载：“1946年1月25日，东北民主联军(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二团，从西、南、北三个方面攻入开通县城，击溃了在城内为非作歹半个月的国民党光复军六旅，解放了开通县。27日，东北民主联军三师八旅二十二团进驻开通县。”

“1946年1月28日晚，洮南支队在东蒙古人民自治军和东北民主联军三师八旅二十二团支援下攻打洮南县城，于29日击溃‘光复军’收复洮南城。”

“1946年2月1日，夏尚志率领部队配合东北民主联军三师八旅二十二团击溃镇东县‘光复军’，击毙‘光复军’司令王奎武，镇东县彻底解放。2月5日，东北民主联军三师八旅二十二团向安广进发，途经套堡区西艾力屯时，遭到崔坤、白庆山为首的地主武装阻击，32名战士壮烈牺牲。”

“1946年2月3日，八路军二十四团，收复安广县城，叛匪逃窜，安广县再次解放。2月20日，叛变之大赉县保安大队长郑焕章伙同安广自治军叛首毛贵生，土匪‘押中央’等千余人围攻大赉县城，被击溃。23日，新四军三师八旅进驻大赉县城。”

“1946年2月9日，东北民主联军三师二十三团一部进驻瞻榆县城，接收了地方维持会保安队，处死了地方维持会委员长刘玉廷，匪首曲凤鸣，瞻榆民主政权成立。”

同月下旬，相继成立了中共开通县委员会和中共瞻榆县委员会。

至此，今天白城市的五个县(市、区)的政权真正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人民群众也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白城及周边地区的相继解放和各级民主政权的建立，为建立以白城为中心的根据地创造了条件。为不断加强和扩大根据地，支援东北的解放战争，1946年6月在今天的白城成立了以陶铸为书记的辽吉省委和以邓华为司令员的辽吉军区，1947年2月又成立了以阎宝航为省主席的辽北省政府。同时西满分局还要求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干部下到农村，西满军区主力兵团也抽调干部下乡，至1946年10月中旬，西满地区已有百分之七十的农村开展了土地改革，有150万农民分得了土地。另据《白城地区志》白城大事记栏目记载：“(1946年3月)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境内各县先后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到民国36年(1947年)6月末，仅瞻榆、开通、大赉、安广、乾安、洮北、洮南县斗地主2934户，农民分得土地486.5万亩，房5.10万间，粮1.33万吨，畜1.96万头。有3.1万户、22.56万人增加土地。民国37年(1948年)6月末，土地改革结束，境内农民第一次实现‘耕者有其田’。”

随着东北解放战争的需要，1946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对部队编制作了大幅度调整：“原新四军三师第十旅、第十一旅、独立旅共同组建为东



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

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后改为东北野战军第39军。原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与山东部队第七师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后改称东北野战军第43军。以西满的原新四军三师的三个特务团为基础，加上地方部队一部，组建了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后改称东北野战军第44军。”

新四军三师已成为历史，而永载人民解放军史册。

新四军三师为白城，为东北乃至全国的解放，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那些来自扬子江畔，苏北大地的新四军三师的官兵和随军北上的地方干部为了今天白城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白城的解放，包含着他们的功劳、汗水和鲜血。(五十七)

成语故事

身无长物



身无长物：除自身外再没有多余的东西，形容贫穷，也喻廉洁。

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记载：东晋王恭官至刺史，清白自持，不治家产。王恭从会稽任职期满回到建康，族人王忱发现他用的竹席很好便讨要一条。王恭把竹席送给王忱，自己却坐草席。王忱说：我以为你回来，一定会有很多竹席，所以才向你讨要一条。王恭说：你不了解，我把这条竹席送给你，便“无长物”（没有多余的东西）了。

范相国 张金亮/图文

我看我说

用诗路串起乡愁和远方

●钟文

只有匹配恰当的诵读仪式、文创产品、研学模式和旅游路线，四条诗路才能串珠成链，牵引人们在乡愁中走向远方。

李白的一首《梦游天姥吟留别》，总能勾起人们对浙东山水的无尽向往。

那些千古传诵的唐诗，其实不仅可供品读、吟咏，也还可以在现实山水情境中感悟、比对。唐诗之路的概念一经提出就引发强烈共鸣，想来就是契合了人们这样的心理需求。

历经20多年的酝酿、推动，唐诗之路已从学术概念逐步重返现实情境：有识之士归纳整理的四条诗路——浙东唐诗之路、钱塘江诗路、瓯江山水诗路、大运河诗路，以清晰脉络梳理了由晋代至清代的文人雅士留下的上万首诗词名篇，以美丽文字展现了诗人行迹图、水系交通图、城镇风物图、浙学文脉图，也由此奠定了“诗画浙江”浓厚厚的人文底色。

浙江的诗路资源到底有多丰厚？仅从天台一地与唐诗的渊源便可看出究竟。天台是浙东唐诗之路的目的地，《全唐诗》收录的2200多位诗人中，就有300多位游历过天台山，留下的诗作则多达1300多首。仅仅一个天台县就能坐拥逾千首唐诗的吟咏赞叹，可见天台的青山丽水、人文风物该是多么富有魅力，同样可见诗人对天台的文学馈赠又是多么慷慨大方。

四条诗路原本就是真实的存在，今人所做的不过是归纳整理工作，如何让这四条诗路串珠成链，牵引人们在乡愁记忆中走向远方，则需要有关各方拿出更多智慧、做实更多工作。

以唐诗之蕴藉，该匹配什么样的诵读仪式、文创产品、研学线路、旅游路线，实在是值得认真研讨、反复论证的大事。毕竟，让唐诗从文字回到它的诞生地，让千古名篇找到最恰当的承载、纪念、传播方式，做得好也很难称得上锦上添花，弄不好反倒容易成为狗尾续貂的赘余。更何况，做实诗路，不能没有产业支撑，而发展类似的文化产业，尚需拓荒前行、稳妥行事。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诗歌里有美丽的乡愁与远方。让诗路串起乡愁与远方，既是历史呼唤，更是时代命题。倘若以敬畏心、使命感做实、做美了诗路，既是对古人青睐浙江山水的回馈与致敬，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中国古代技术发明之十九

竹子的栽培与综合利用

●李昂

竹类植物因地上茎的高度木质化在禾本科中构成较特别的一支。其自然分布区中，以亚太区所产最为丰富，而中国更是中心产区，竹林面积广大、种类繁多。

因为具有生长速度快、繁殖力强、茎秆中空而质地坚韧等特征，竹子可以用于制造各种器物，甚至建筑。中国的先民从新石器时期便已对此有所认识并开始加以利用。如反映原始社会狩猎生活的二言诗《弹歌》云：“断竹，续竹；飞土，逐穴(肉的古字)”，描绘了用竹子制成弹弓猎取动物的场景；在湖南洞庭湖新石器遗址发现的竹墙残迹，表明六七千年前竹就被用于建筑；而浙江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篓、谷箩、篮、簸箕、簞等则证明竹用于日常生产生活已有五千年的历史。

我国栽培竹子的历史也至少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诗经》中有“瞻彼淇奥，绿竹青青”的诗句，刻画的就是竹园中的景物。此后，竹子依种类不同，被广泛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竹筷、竹筒、毛笔、笙箫笛管、乃至“以竹丝为布，断材为柱，为栋，为舟楫……”此外，竹子的食用和药用价值，也早已被发现。到了晋代，戴凯著《竹

谱》，将前人对竹子的认识进行了一次总结，记述了数十种竹名和超过三十种竹子的具体用途。魏晋时期，还对竹园进行官管，设置了“司竹监”管理竹林、以供国用。苏东坡曾经感慨地说：“食者竹笋，庇者竹瓦，载者竹筏，爨者竹薪，衣者竹皮，书者竹纸，履者竹鞋，真可谓一日不可无此君也。”

因其枝干挺拔、中空有节且四季青翠的形态特征，竹也被中国人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寓意，而大量出现在诗歌、绘画等艺术作品中。

竹子可以说遍及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和精神生活，著名科学史家贝尔纳(J.D.Bernal)因之称中国是竹子文明的国度。



勤政为民是为官处事的一种重要品质。“勤政”，既表明了为政者的担当和责任，也是人民对为政者的一种要求和期望。千百年来，古代先贤常用“律已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作为官箴，告诫为政者，人既为官，就应常怀无为而愧的操守良心，勤政实干，“早入晏出，奉公忘私，虽休勿休，恪勤匪懈”，具有吃苦在前的觉悟，提高造福于民的能力。《呻吟语》中说得好：“做官都是苦事，为官原是苦人。官职高一步，责任便大一步，忧勤便增一步。”一个人若任官职，就应勤于政事，甘于劳苦，经常用“勤不道苦”自警自励，念念不忘“为官之责”，把心思用在干事上，把精力放在落实上，通过有所作为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中国古代仁人志士向来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提出了许多勤政为民的良策嘉谏。《尚书》中说：“业广惟勤”，认为“勤”是发展事业的唯一途径。明人所著《初仕要笈》中提出：“初仕以勤政为首务，政不勤则百事殆。”曾国藩认为：“做人之道，以勤、廉、信、慎四字为要。勤可以补救愚拙，不知者将渐知，不能者将渐能。”他对“勤不道苦”有着更深的理解：“能吃天下第一等苦，乃能做天下第一等人。”

宋代的范仲淹一生有志于天下，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抱负，体现出强烈的家国意识和担当精神。他无论何时何地，“当官任职，不计难易，而志在必为”。范仲淹在泰州为官时，征调民众四万多人，重修捍海堤。经过五年苦干，修成

勤不道苦官之责

●史世海

长约三百公里的新堤，不仅使百姓的生活、耕种和产盐均有了保障，还在“捍患御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地百姓将所修之堤命名为“范公堤”。范仲淹调任苏州知州时，适逢苏州发生严重水灾，他夙夜营救，“惟日夜谨事，与众协力”，带领民众疏导河渠，引水入海，与此同时，也努力赈济灾民。范仲淹第三次被贬后，在其原籍苏州吴县捐田设立义庄，义庄收入用于救济家庭困难的百姓，此项善举传承长达八百多年。《宋史》评价范仲淹说：“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范仲淹贤，无愧乎此。”王安石也称范仲淹为“一世之师，由初起终，名节无疵。”

古有名言：“处事者，不以聪明为先，而以尽心为急；不以集事为急，而以方便为上。”处理政事的官员，不是把聪明放在第一位，而是把全心全意放在第一位；不是把事成有功放在第一位，而是把方便百姓放在第一位。“为官一任”，给了官员施展才华的舞台，但要“造福一方”，还要真心实意地勤于政事，不辞劳苦为百姓操心、担责、排忧解难，让他们真正享受到更多福祉。若如此，则是自己之幸，事业之益，百姓之

利。历史上凡是为政有道的官员，大凡都能“君子任职，则思利人”，在“勤不道苦”上知责履责，责尽心安。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殚精竭虑于蜀汉大业，担任丞相后励精图治，勤于军务，安抚百姓，明示礼仪，常常“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见利不贪，见美不淫”，坚持做到“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直至最后“志决身歼军务劳”。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历来为后人所景仰，杜甫曾赋诗赞叹：“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唐代的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时，引导百姓“凿井百口”，改变了长期以来饮用生水的习惯；释放奴婢，终结了“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的落后风俗；重修孔庙，创办学院，带头破除迷信；组织劳力在城郊开荒垦地，植树种菜，鼓励发展生产。他的“称职在勤”，深深赢得百姓爱戴，“柳州旧有柳侯祠，有德于民祀之”。

宋代的赵抃任越州知州时，吴越一带遭遇严重旱灾，他早晚操劳，部署救灾，采取了四种恤民对策：筹集救灾物资，制订救

灾办法，收养孤儿，防疫治病，从而使“生者得食，病者得医，死者得葬”。曾巩为此写了一篇《越州赵公救灾记》，赞叹说：“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赵抃为官多年，“所至善治，民思不忘”。

元代的张养浩在陕西大旱时，受命为陕西行台中丞，他不顾年事已高，星夜赶赴任所，遇到饥饿的灾民就赈济，看到饿死的灾民就埋葬。到任之后，“凡所以力民者，无所不用其至”。张养浩在陕西做官四个月，从未回家住过，一天到晚忙于救济灾民，没有丝毫的懈怠，终因劳累过度卒于任上。消息传开后，“关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

清代的陈宏谋为官三十余年，任经十二行省，每到一处，都要仔细了解民生风俗、地方利弊，继而革旧布新，解除民困。陈宏谋的勤政，尤以修水利、治水患最为突出。大至黄河、洞庭湖、海河、运河，小至乡间小河、湖塘，他都亲历治理。陈宏谋说：“吾辈居官，当事从民生起见，计久远，不计目前；尚事实，不饰虚文，方不负朝廷为民设官之义，方不负此生读书济世之意。”

明代著名思想家薛瑄著有一部《从政录》，旨在探讨如何重典知史，他认为切勿轻忽民众的事，而要把它们看得很艰难；切勿安逸地坐在官位上，而要把做官看作是一件危险的事。岂止君主应当这样想，凡是当官的人，也都应当这样去想，把它当做是爱护民众、保存自己的方法。先贤语重心长的忠告，今天读来不还是那样振聋发聩吗？